



在童诗领域,许多作家、学者一直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看不懂的诗。实际上,这不应该是一个新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朦胧诗”的出现,就让一部分读者直呼晦涩、难懂。自那时起,晦涩、难懂,就成了一部分读者对现代诗的整体印象,也成了现代诗歌史上一度争议不休的话题。

这个问题的产生与时代有关。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人的经验、情感都呈现出多元繁复的状态。在这种生存境况下,一部分诗人尤其是年轻的诗人,不满足于以往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而多用隐喻、通感、象征等手法,着力捕捉诗人的潜意识、幻觉和瞬间感受;又通过时空颠倒、意象叠加和句式的大幅跳跃等形式,让读者产生多重意蕴和不确定的印象。这就出现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等一批年轻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主题晦涩、手法新奇,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不小的争议。就连当时的知名诗人公刘,对其也感到骇异、敏感和担忧。一批年轻诗人的探索精神、挑战传统审美规范的先锋实验,使一部分具有传统阅读习惯的读者很难接受。有关“晦涩”的争议,大致由此而起。

那么,“晦涩”的产生,与诗歌本身有没有关系呢?自然有关系。我们说:诗人写成了一首诗,可这首诗只能说完成了一半,而另一半则需要读者去完成。有一种理论叫“接受美学”,意思是在文学作品中,总是留有许多空白之处,这些空白是由读者不断阅读,创造性地去填补的。诗歌更是这样。一首诗写成了,它的意义是通过读者的不断阅读来实现的。我这里说的阅读,不是一般性的阅读,而是一种精细阅读,是深入到一首诗的肌理中的阅读。从一首诗的意象、节奏、韵律、语言等方面入手,去发现这首诗的审美价值,进而产生自己对这首诗的理解。读者不同,对一首诗的理解自然不同。我们先来看看诗人臧克家的《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儿童动物小说:锻塑儿童的生命观、生态观

□徐 霞

动物小说是指在基本遵循生物学、动物学知识的基础上,以动物主人公的生命经历为主要线索,审美地讲述动物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的文学创作。儿童动物小说是作家有意识地以儿童读者为阅读对象而创作的动物小说。儿童动物小说的写作,并非只是对生物世界的照搬与复制,它需要作家以滋养童年生命成长为旨归,融入写作主体丰富的想象与生命体验。

书写动物生命经历,呈现自然生态的丰富与脆弱,批判与反思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倡导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引导童年生命健康明媚地成长,是儿童动物小说重要的文学使命。儿童动物小说应该让孩子们在生命之初就正确认识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明确人类应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引导树立正确的自然观与整体主义的生态观。得益于全人类对生态问题的重视,新时代儿童动物小说整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创作总体呈上升趋势。

直呈自然生态的丰富与脆弱

1980年,在祖国西南边陲云南西双版纳插队多年的沈石溪,在《儿童文学》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动物小说《象群迁移的时候》。从此,沈石溪便赶着他的狼群、猎犬、象群、猎猫,带着热带雨林的神秘、原始、野性,带着红土高原的丰富、苍茫和风情万种,开启了动物与儿童文学碰撞融合の旅程。随着宗璞的《鲁鲁》(1980)、张昆华的《蓝色象鼻湖》(1980)、李传锋的《退役军犬》(1981)、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1982)、蒯瑾的《冰河上的激战》(1982)、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1982)、李迪的《豹子哈奇》(1982)、郭玉道的《索南和他的伙伴》(1983)、戈隆阿弘的《阿黑和他的画眉鸟》(1983)、乔传藻的《哨猴》(1983)等作品的发表,动物们作为叙事主人公,大规模“闯入”儿童文学。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萌发、90年代的沉淀,儿童动物小说在新世纪稳定发展。

儿童动物小说从儿童的审美趣味出发,书写动物们在大自然中的命运悲欢。阅读儿童动物小说,孩子们可以审美地领略自然生态的丰富与多样。透过刘克襄的《座头鲸赫连么么》(1993)、张剑彬的《悲情咸水鳄》(2013)、杨鹏的“海豚王子”系列(2019)、陈玨的《小鳄鱼贝儿和它的短人护卫队》(2021)、沈石溪的《海豚之歌》(2022)等动物小说,孩子们感知到了覆盖地球四分之三表面积的海洋的壮阔与深邃。比起海洋,陆地在儿童动物小说中得到了更充分的

书写。黑鹤的《鬼狗》(2006)、刘虎的《心在旷野》(2017)、毛云尔的《风雪狼途》(2017)等作品呈现了荒野的野性粗粝,黑鹤的《黑焰》(2006)、许廷旺的《草原犬》(2017)等小说将孩子们带到绿意盎然的草原,沈石溪的《狼王梦》(2009)、王跃的《雪地藏獒》(2009)等作品展露的圣洁与辽远,沈石溪的《罗梭江上的象警》(2012)、牧铃的《江豚少年》(2017)等小说则诉说着江河的水流奔腾,范锡林的《影子保卫战》(2015)编织着热带雨林的神秘与曼妙。

蔚蓝色的海洋与瑰丽的陆地一起组成了斑斓多姿的大自然。如果说大自然在初期儿童动物小说中还只是点缀动物故事发生的背景,那么随着人们认识和了解自然程度的加深,大自然本体的审美价值已在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动物小说中形成。自然生态是丰富的,也是脆弱的。这是因为人类一度把自己当作万物之灵,割裂甚至背弃了为生命存在提供物质原料和精神慰藉的大自然。人类曾肆意地开垦大地,全然不顾它的满目疮痍,也曾因不断膨胀的物欲,过度砍伐森林,对森林中众多生灵的生命创痛置若罔闻。盲目逐利的人们也曾对奔涌的江河、大海拼命索取,致使水源污染,海洋环境恶化。人类的高歌猛进、大肆掠夺,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的稳定与多样。

儿童动物小说在呈现自然生态丰富的一面的同时,也沉痛地向读者展现了其脆弱的一面。郭雪波的《沙狐》(1985)、雪漠的《沙漠的豺狗子》(2023)等小说,将荒漠地带的苍凉、死寂带到读者面前,让孩子们看到自然生态的脆弱。儿童动物小说审视批判人类给自然生态造成的伤害,特别是对人类伤害、毁灭动物生命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控诉,掷地有声地发出生态警示:如果人类无视自然规律,肆意妄为破坏环境,掠夺自然资源,将会造成严重的生态恶果,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形式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播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种子

儿童动物小说的出现与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生态问题有直接关系。当空气污染、气候变暖、水源枯竭、动植物资源锐减等生态问题不断出现,严重威胁到生命赖以栖居的星球的良性运转时,有生态良知的作家越来越意识到修复人与自然亲密关系,在意、关心动物生存处境的重要性。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对动物生命的存在是漠视的,甚至还因为自身的欲望去伤害、毁灭动物,不少动物的生存与繁衍因此岌岌可危。儿童动物小说及时关注到了动

物堪忧的生存状态,批判人类冷漠破坏动物家园,摧折动物生命的行径,反思人们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儿童动物小说敦促人类正视动物与人平等地享有栖居在地球上的权利,向儿童播撒人与动物命运息息相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种子。

儿童动物小说通过呈现动物生命在大自然中危机四伏的处境,让孩子们更真切地体察到动物们的生存艰难。金曾豪的《愤怒的狐狸》(2011)开篇就让读者了然红狐夫妇在冬季的生存难题,它们能够获得的食物少得可怜。食物短缺,动物连生存基本的饱腹都无法保证,生命也因此飘摇而脆弱。动物们想要活下来,要经受的考验不仅仅只有食物短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样让动物们活得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朱新望的《小狐狸花背》(1984)中的狐狸夫妇虽生下了六只小狐狸,可最终存活下来的却只有一只。从六只到一只,狐狸幼崽数量上的锐减充分说明了动物们“生的艰难”与“活的不易”。除了丛林世界的步步紧逼,人类的残忍捕杀也让动物的生命时刻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张剑彬的《大憨鲨的愤怒》(2019)就让读者看到了海洋动物大憨鲨被人类疯狂诱捕、残忍杀害的悲惨命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大胡子等人疯狂地向大憨鲨举起屠刀,大憨鲨的生命因此遭到威胁。当孩子们从作品中读到大憨鲨的坎坷命运,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的生态情感便会油然而生。

不得不承受的食物短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及人类肆意的猎杀,无不在悲伤地诉说着动物们不容乐观的生存处境。儿童动物小说沉痛地书写了自然界中动物生命的危机四伏,富于审美地激发了少年儿童对动物生命的关爱,能帮助孩子们在生命之初就树立起不伤害动物生命,力所能及善待、救助动物的生态观念。

捍卫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儿童动物小说为孩子们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动物个体的生命故事。小说中,动物们有着与大自然同频共振的生存智慧,孩子们可以从它们身上看到生命最朴素与本真的存在状况。动物们不轻易屈服于生命之重,它们努力求生,执着地找寻并确认自我的主体价值,展现出生命之为生命的崇高价值。儿童动物小说的基础是讲述动物的故事,必须遵循丛林世界的既定规则;但儿童动物小说的内核是小说,是文学作品。文学是入学,是观照与开掘人的内心世界,烛照生命成长的审美存在。由是,儿童动物小说的写作不能只是对生物世界的照搬,不能

写成科普读物,而需穿透动物世界表层的规则、现象,去发现与洞察生命的轻盈与厚重、纯真与善美、有限与永恒,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引导孩子思考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助力童年生命的健康成长。

优秀的儿童动物小说之所以具有动人心魄的文学魅力,除了有一个个精彩的动物故事,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作品写出了生命本身的力与美。在梁泊的《银鼬》(1987)中,小银鼬齐卡面临冬天找不到食物却又必须照顾好妈妈的双重难题,因此,它的生存陷入极大的困境。毛云尔的《风雪狼途》(2017)同样写到北山狼群一次次捕猎却一次次空手而归,饥饿又疲惫的狼群已到了崩溃和死亡的边缘。然而,面对生命的沉重,齐卡和北山狼群都没有听之任之,它们身上展现出不被生计所困,在绝望中开掘出希望的生命力量。当动物们一次次为获得食物殊死拼搏,又或者为了逃过猛兽的猎杀奋力反抗时,在它们明知活着不易却依然主动牺牲自己为种族求得更大的生机时,生命本身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便被充分展现出来。这份生命的重量,能让孩子们更好地认识到生命本身的可贵与美好,从而让孩子们更加敬畏与珍爱生命。

儿童动物小说常出现这样的动物主人公,如《冰河上的激战》中的驴王“江颜鸣丹”、《座头鲸赫连么么》中的赫连么么、常新港《老鼠米来》(2008)中的老鼠米来等,它们不满足于草率地活着,在不断追问“我是谁”的过程中,澄清、明确了“我何为”的生命价值,重申并坚守着“我所不为”的生命尊严。从这些动物主人公身上,儿童读者可以窥见生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尊严,对个体生命的责任、担当与超越有了更积极与正向的认识,健康诗意的生命观的形成便有了可能。

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轨道,儿童动物小说也因此迎来了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新契机。新时代儿童动物小说的价值内核来源于全人类对生态问题的重视,对动物生命的人文关怀,来源于儿童文学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来源于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持续解放。这一创作趋势对当代社会关心的生态问题、童年生命健康成长的问题等都进行了及时的文学捕捉与反映,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本文系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专业委员会高校儿童文学理论研讨课课题“中国当代西部儿童文学史”阶段性成果)

怎样看待“读不懂”的童诗?

□王宜振

任它们在里面惊慌地奔跑
却始终不能够逃离
孩子笑够了,玩腻了
也许会抹掉圆圈
释放这些无辜的蚂蚁
但是,蚂蚁的不幸还在后面
——因为染上了樟脑的气味
它们又被同窝的兵蚁无情攻击

对于蚂蚁们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悲剧
可对于那个孩子
只不过是有一个有趣的
微不足道游戏
这首小诗,从文字上看并不难懂,可这首小诗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似乎也不明晰。也就是说,这首小诗在主题方面,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诗呢?他是因为给读者提供更广阔的想象空间,诗中有些东西没有告诉读者,恰恰是需要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去补充。读完小诗,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小诗的主题看似模糊和不确定,实则整首诗都具有象征性,可以象征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象征人与人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种叫意象模糊。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老马”这个意象,它没有确指,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再看看意大利诗人多米诺的《尘土中的麻雀》:

 每天早晨,在尘土中,
 我用扫帚追捕麻雀。
 在四个屋角
 我找到了四片羽毛。

每个夜晚我的麻雀飞来,
每个夜晚
它从我的胸脯上采摘
四颗睡眠的水珠。

我追捕着,但终无所见
夜间同样如此:当它飞来,
它采摘四颗睡眠的露珠,

如此迅速!

我努力用它早晨的羽毛
织成锦缎,夜晚盖在我身上。
羽毛呵,你们太少
而我的扫帚又已折断。

如今在四个屋角,
我听到它的羽毛沙沙有声,
它的尖喙敲响,
啜饮四颗睡眠的水珠。

它整夜敲着我的胸脯,
直到捣碎我的骨头。
这首小诗相当优美,干净得令人吃惊。诗人写了“我”和“麻雀”的关系,但又不是现实中的麻雀,而是非现实中的麻雀。就连“我”,也被这麻雀带动得有了非现实的味道。这可以称得上是一则寓言,寓意并不明确。我们不知道麻雀代表什么,只知道它最终捣碎了“我的骨头”。这首诗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恰恰给了读者更广阔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可以去想象很多东西。它不是让人一看就懂,而是让人去玩味,长期地反复地玩味。在玩味中,你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感受。如果说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我自然更崇尚后者。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呢?是朦胧晦涩的,还是让人一看就明白的?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诗的优劣,

不能用“朦胧”和不“朦胧”区分。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被公认为难以看懂的诗,却是世界级的经典。明白如话的诗,也有许多经典。何况,“朦胧”只是对一个时间段而言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现在看来,有些完全是可以读明白的。再说,“朦胧”不“朦胧”,还与读者的阅读经验有关。读者甲感到“朦胧”的作品,对阅读经验丰富的读者乙来说未必“朦胧”。

那么,好诗有没有一个标准呢?诗评家黄菜笙曾谈道:“优秀的诗歌作品会在纵横两极追求的坐标点上出现,纵轴的追求是精神的高度,横轴的追求是语言的精度,纵横交错之处可见精品。”我深以为然。要想创作出诗歌精品,精神的高度和语言的精度,两条标准必须完美统一,缺一不可。用一句通俗的话说:那种读时惊心,读后牵心,隔长隔短,无论什么时候想起依然动心的诗,才是诗中上品。童诗也是如此。

(作者系儿童诗诗人)

